

“国烟”大品牌 “中华”六十年(上)

■ 戎国荣

中华牌卷烟诞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根据1951年2月12日出版的《烟业日报》“中华公司开始供应中华牌卷烟”的消息称:“华东工业部中华烟公司经过相当时日研制的中华牌卷烟,现已正式出品。”中华牌卷烟的问世,宣告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品牌随着新时代的诞生而开始了她的光荣历程。

“最好卷烟品牌”的诞生

1950年代,我国烟草行业正处在接收外国资本企业、重组民族企业,百废待兴的一个新时期。烟草工业以极大的激情开始进行新时代的工业经济建设,一大批新牌名的卷烟诞生,从烟标的艺术创造上,成为一种贴近时代精神的产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风貌。在此期间曾产生了“欢庆”、“祖国”、“解放”、“新中国”、“新世界”、“东方红”、“秧歌舞”等新牌名的卷烟,表达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欢欣。

但是,烟草工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赶超国外卷烟的质量,成为行业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建国之初的烟标设计,在创新牌、运用新图案的基础上,仍利用传统的艺术风格,延续历史悠久的老牌,但大部分已经逐步进行了改观。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提高低烟质量问题作了重要亲笔批示,要求“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

记忆里的烟叶

■ 小七

小时候,父母亲靠种植烟叶养家糊口,自然,我就成了烟叶生产得力帮手。

天还处在黑暗之中,我们就到了烟地。父母亲开始冒着露水掰烟叶,我就把掰下的烟叶抱到板车上,不一会儿,二百多地的烟叶已经掰弯,而天的东方刚刚放明。

回到家里,我们赶紧吃早点,就坐到家的门口,往烟杆上绑烟叶。这是我极不情愿干的事情,因为绑紧了烟杆太重,绑松了又要得埋怨,但为了赶时间,就得抓紧绑。

绑好了烟叶,就抓紧往烟炉赶,因为好多家合伙用烟炉,不能等着一家;再者,烤烟是有时间界定的,不能拖延。我就帮着父亲,把板车上烟杆挂到烟炉里,那是非常费力的活儿,谁都不愿干。

最为高兴的事情,就是到烟炉下烟。看着干黄的烟叶,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因为我的学费有了着落。把烟叶拉回家里,就开始解烟了,这也不是个好活,得长时间坐在那里,把颜色、长短一致烟叶扎把。有时,我感到头晕眼花,因为扎把是件费力的活儿。

到烟站卖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烟农太多,有时得等上一天时间,但是,没有什么法子。但苦中有乐,当拿着崭新的钞票,脸上往往露出了笑容,因为许多愿望就能变成了现实。

现在,父母亲已经不种烟叶了,但是,记忆里的烟叶仍让我感到生活的不易。

戒烟? 抽烟

■ 和平

是戒烟?还是抽烟,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难题。

我喜欢抽烟,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抽烟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幸福!尤其,夜晚来临,坐在桌前读书,抽烟成为一种爱好,那时,悠然点上一支香烟,在明灭的火光下,享受烟香,简直是种享受!

戒烟,这是我不愿的事情,因为戒烟让自己难受。由于健康原因,有时我不得不戒掉香烟,但香烟的魔力,常常让自己感到不可思议,无人处,常常点上一支,独自享用。

“吸烟有害健康”,别人常常警示我,让我对于“有害”有了恐惧感;但是闻到烟香,我只好俯首称臣,因为我无法抗拒。在戒烟的时段里,我没有忘记抽烟,只是抽烟数量减少了。

抽烟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但我总会躲到无人处,偷偷享用。其实,我是非常乐于抽烟的,戒烟只是美好愿望而已。不管怎么样,我总是找到借口,去品尝自己的爱好。

常常听到别人说:“他身上的烟味特别大。”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就想减少自己的吸食量。戒烟不就没有了吗?难道我能接受吗?我从内心里,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抽烟也是我的生活一部分。

我常常想,假如没有了烟抽,那将是多么可怕!于是,我又拿起了烟盒,抽出了烟支,狠命吸上几口,淡然地微笑着,香烟真好抽。

我不想戒烟,只想抽烟,因为抽烟是种快乐。

最好不吸私营纸烟。”可以看出,毛特别强调吸国营卷烟,以支持国营卷烟工业,倡导国营卷烟品牌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弘扬民族志气,创民族品牌,上海国营中华烟公司以“中华”命名,成功试制了“最好的卷烟品牌”——“中华”高级卷烟。

中华牌卷烟的诞生,始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除了“中华”的名称来自于企业名称外,最重要的是上海烟草创造了一个划时代的非凡品牌,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的骄傲。

经典卷烟商标的设计

中华牌卷烟最早的1951年烟标版式,是以双华表和五角星的图案为设计主元素。烟标的底色运用了中国传统吉祥的大红色,图案为北京天安门前的大华表,左右两侧的华表中间是一大四小的五角星,似国旗的排列。作为装饰,由八片色泽金黄的烟叶组合而成的圆形花环,在内圈嵌入一颗硕大的红色五角星。在这枚烟标上,还有一段广告文字:“中华牌香烟为本公司出品之超等香烟,完全采用高贵原料精制,烟味和醇,为国产烟中最名贵出品。”从中可见,“中华”的定位是高级产品。它的设计风格,在于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对以五星红旗为标志的一个新世界来临之际的赞美和盼望。但这种前奏曲似的版式,前后仅使用了一年左右。



■ 王晓斌

我的父母都是新烟职工,于是从我记事起,就认识了红“雪莲”牌香烟。记得当时父亲的同事经常来聊天,大家围坐在客厅里,父亲拿出储存的红“雪莲”与大伙一起分享。绑好了烟叶,就抓紧往烟炉赶,因为好多家合伙用烟炉,不能等着一家;再者,烤烟是有时间界定的,不能拖延。我就帮着父亲,把板车上烟杆挂到烟炉里,那是非常费力的活儿,谁都不愿干。

最为高兴的事情,就是到烟炉下烟。看着干黄的烟叶,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因为我的学费有了着落。把烟叶拉回家里,就开始解烟了,这也不是个好活,得长时间坐在那里,把颜色、长短一致烟叶扎把。有时,我感到头晕眼花,因为扎把是件费力的活儿。

到烟站卖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烟农太多,有时得等上一天时间,但是,没有什么法子。但苦中有乐,当拿着崭新的钞票,脸上往往露出了笑容,因为许多愿望就能变成了现实。

现在,父母亲已经不种烟叶了,但是,记忆里的烟叶仍让我感到生活的不易。

扑克甩进烟标里

■ 常德礼

在研究了26年之后,德国科学家近期宣布,1988年在亚琛大教堂发现的千年遗骨确实是扑克牌中红桃K的人物原型——欧洲中世纪法兰克王朝的国王查理曼大帝。

众所周知,现今国际通行的54张一副的扑克牌中有4张K,其中除了红桃K是查理曼大帝之外,黑桃K代表的是十世纪以色列王国的首位君主大卫王,方片K代表的是古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而梅花K代表的则是著名的古代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

扑克是英文poker的音译,它是一种流行全世界的大众娱乐工具。扑克虽小,但其

“黄鹤楼”里父女情

■ 佟才录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是老么,因此父母非常溺爱我,每次出门走亲戚都一定要带上我。

一次,大姨家的大表哥结婚,父亲母亲带着我去大姨家参加婚礼。来到了大姨家,二姨、二姨夫、三姨、三姨夫都已经来了。家在城里的二姨夫是开着小汽车来的,家在镇上的三姨夫是骑着摩托车来的,只有爸爸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见了二姨夫和三姨夫,爸爸从衣兜里掏出一包“葡萄”烟,先抽出一支递给了二姨夫,不想二姨夫一抬手把爸爸递过去的烟给挡了回来,然后从他的皮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黄鹤楼”香烟,说:“现在谁还抽‘葡萄’烟啊?我还是最喜欢抽我的‘黄鹤楼’。”爸爸尴尬地又把烟递给三姨夫,三姨夫不接爸爸的烟,却掏出身上的打火机,咔一下打着给二姨夫叼在嘴边的“黄鹤楼”点燃,然后把手伸向二姨

华东工业部中华烟公司于1952年2月1日注册时,中华牌烟标已经是经修改过的模式20支包装装样。修改后的烟标图,取消了与国旗图案相似的五颗五角星和以烟叶装饰的设计,改为由黑体结构描出的金色天安门,以天安门为主图的设计方案,从此成为中华牌烟标的经典图案。

之后在国营上海烟草工业公司和上海卷烟厂延续生产中华牌卷烟的同时,对中华牌烟标进行了适当的修正。天安门图中两侧在华表分别向左右推移,使得天安门图更加突出,显得蔚为壮观;三朵云彩亦被取消,这种不加修饰的图案,产生了更为真实的感觉效果。1966年8月,为使中华牌图案更为精到,上海卷烟厂派员经实地拍摄后又一次将图案作了细致的调整和描绘,使之在比例上更精确。从此,中华牌的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中华牌烟标的设计庄重而大气、典雅而华贵,随着中华名烟的美誉,以其独特的品质铸就了时代的美感;在产品立于民族的渊源之中,产生了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中华”烟标版式的变化

烟标记载了品牌的历史和发展,同时又因特定的时期和事件,如企业名称的变更、特别事件的纪念、特别制造的需要、特殊标记的产生等,而有了不同变化的版式。

我家的“雪莲”情

望姥姥、姥爷,每次要带几条红“雪莲”回家,老家的亲戚和邻居听说我母亲回来了,就会赶到姥爷家看望母亲。母亲便高兴地拿出红“雪莲”给每人送上一盒,这时他们就像得到宝贝似的捧在手里,心里乐开了花。有的人还舍不得抽,经常在耳边夹上一支红“雪莲”到处炫耀,说这是新疆的红“雪莲”牌香烟,是新疆的优质产品,只有遇到最好的朋友或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递上一支。八十年代末,姥爷病重,母亲打长途电话询问姥爷需要什么?姥爷毫不犹豫地告诉母亲,自己特别想抽红“雪莲”。

九十年代初,我在外地求学,那时烟厂的特制“雪莲”牌香烟很走俏,每次从家里回学校,我带给室友的礼物就是每人一包特制“雪莲”。晚上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我们哥们六个坐在床上,一边谈古论今,一边点上一支特制“雪莲”吐着烟圈慢慢品尝,此时我就会经常把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新疆卷烟厂的历史和特制“雪莲”牌香烟隆重介绍一番,当时他们惊叹的表情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很荣幸我毕业以后,成为新烟的一员。那时,新烟正在生产金“雪莲”牌香烟,每当在车间机台上看到自己生产的一包包金

所蕴含的文化积淀相当深厚。同时,因为扑克牌携带方便且玩法多样,所以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这点从我国生产的烟标中也可可见一斑。

上世纪30年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出品有以扑克牌中方片K为主副版图案的“KING”(王牌)烟标。而上世纪20年代上海中国德隆烟草公司出品的“茄克”烟标主版则是以扑克牌中的J牌为主图案,其副版图案分别由扑克牌中黑、红、花、片四张J牌组成。在上世纪40年代鸿顺烟厂出品的“JOKER”(捷克)烟标副版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张红桃K和一张黑桃A。

我们在玩扑克牌的时候,通常喜欢用“打”或者“甩”这两个动词冠在“扑克”的前面。“打”或者“甩”比较形象地描绘出了玩

“黄鹤楼”里父女情

支递给父亲。父亲的手颤颤的,哆哆嗦嗦地把烟放在嘴角。我给父亲点燃,父亲使劲地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缕儿烟雾,眼睛湿润地说:“‘黄鹤楼’,好烟啊好烟!”我豪气地对父亲说:“好抽你就管够抽!往后我供着你。”以后,我每月发薪水都不忘给父亲买两条“黄鹤楼”捎回家,父亲打电话说不用买那么多,他抽不了,一条就够够的了。我又打电话给母亲,烟瘾很大的父亲,怎么一月只抽一条烟?母亲告诉我,你爸是心疼你花钱,在“黄鹤楼”烟盒里装着“葡萄”和“黄鹤楼”两种烟,在外面就抽“黄鹤楼”,还对人说是女儿孝敬的,在家里抽“葡萄”。

后来,我在镇上开了一家超市,烟柜里“黄鹤楼”是主打烟。父亲每次来家里,我都指着烟柜里的“黄鹤楼”,对父亲说:“爸爸,咱家现在有的是‘黄鹤楼’,你就放心大胆地可劲儿抽吧!”父亲眉开眼笑地说:“得嘞!还是我闺女孝顺我,懂得她老爸!”

后来,我在镇上开了一家超市,烟柜里“黄鹤楼”是主打烟。父亲每次来家里,我都指着烟柜里的“黄鹤楼”,对父亲说:“爸爸,咱家现在有的是‘黄鹤楼’,你就放心大胆地可劲儿抽吧!”父亲眉开眼笑地说:“得嘞!还是我闺女孝顺我,懂得她老爸!”

在中华牌六十年发展的历史上,最值得记录的是制造企业名称的八次变化。中华牌由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1951年创牌。1952年2月,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向中央私营企业局申请商标注册。因为体制变化,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烟标上就进行了两次商标变更。国营上海烟草公司于1952年4月成立,中华牌商标于1952年9月变更;国营上海烟草工业公司于1954年10月成立,中华牌商标于1955年10月变更。

中华烟草公司于1953年1月并入国营上海烟草公司,中华牌商标先于数月已变更,为烟标的印刷、包装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而第二次变更则晚了整整一年,其原因没有史料记载。上海卷烟二厂在1952年8月接手生产中华牌卷烟。直至1960年12月,上海卷烟二厂转入上海卷烟厂。自此,中华牌一直由上海卷烟厂生产。1963年3月,中央轻工业部决定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这个烟草托拉斯经济组织要求在烟标上统一标注“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中华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数年中即以此为又一种烟标版式,直至1969年。

以中华牌出品的年代顺序,其企业名称先后为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国营上海烟草工业公司、上海烟草工业公司、上海卷烟二厂、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上海卷烟厂、上海烟草(集团)公司上海卷烟厂、上海烟草(集团)公司等。

洋火的记忆

■ 刘振龙

前不久,老家邻居一位大哥去北京探亲,返程途经安阳到我家,因为我们是发小,挽留他小住数日。他大我两岁,身体硬朗,性情直爽,快人快语。他人缘好,但烟瘾很大,一天到晚早烟袋不离手,塑料袋里装着当地产的“一口蒙”烟丝,一响至少得要吸20烟袋。他突然说:“二弟,家有洋火吗?给我找一盒。”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但马上悟了过来,洋火不就是火柴吗?我递给他一个打火机,他说那不好使,用不惯。我赶紧找出家里仅有的半盒火柴,他笑着说:“还是这用着得劲。”大哥要用洋火吸烟,使我回想起60多年前许多有关洋货的事情。

所谓洋货,是与土造货相比而言的。那个时候我国根本没有几个像样的工厂,很多外国的商品都冠以“洋”字,比如洋布(机织布)、洋车(自行车)、洋烟(纸烟)、洋线(机纺棉线)、洋油(煤油)、洋钉(机制钉)、洋火(火柴)、洋灰(水泥)等。

洋火与火镰。我老家周边那几个县的农民大都吸旱烟,这是历代传下来的习俗,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吸旱烟。想当年,由于家境贫寒,爷爷吸烟舍不得花钱买洋火,就采割一种青灰色的嫩蒿,晒干后搓成像食指粗细的蒿绳,用火镰打在火石上,撞出火星,点燃易燃的蒿绳,然后用嘴猛一吹蒿绳燃出火苗,点着烟,一连吸3袋才过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他的子孙们买来火柴,爷爷再也不用着火镰了。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会不时说出“洋火”这个词。

洋车与怪物。我国是自行车王国,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一辆。可在1952年以前,我们全村乃至全乡都看不到一辆自行车,偶尔进城看到有人骑着非驴非马的铁家伙跑得飞快,觉得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那是洋车。想当年,我们村刚解放,驻村土改工作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把我们这些七八岁以及十几岁的男孩子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在村口站岗查路条。有一天,一个穿戴整齐的青年人骑车到村口,十几名儿童团员一拥而上堵住他,看他骑的这个怪物便觉得不像好人,向他要路条。他说,你们村的村长是我姐夫,我是来串亲戚的。我们说,那不行,必须凭路条才能放行。他拿出盖有城关镇红印的路条后,我们才放他进村。他骑车在前,我们这群孩子跟着洋车跑,一直跑到村长的家门口,伸手摸一摸这个竟然能跑那么快的铁家伙,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54年年底,县乡干部在村里搞农业合作社试点,不断有人骑车来来往往,见得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了。1955年,我用驻村乡干部的洋车学骑车,因我个高腿长,两天就学会了。1985年,我们全家五口人每人一辆自行车,出门办事非常方便。

洋布与粗布。现代人买衣服非常讲究布料和款式,但在60多年前,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线织成粗布缝制而成。童年时代,每当我穿上新衣服,马上就会找玩伴炫耀一番。村里有个富家子弟穿的是洋布衣服,远看很平展,近看没有皱褶,用手摸摸感到很柔软,我很羡慕。他昂着头说:“这是洋布做的。”我回家问爹娘,啥是洋布?父亲说,就是洋人织的布,咱买不起。我说:“俺娘做的衣服更结实,我才不稀罕哩。”新中国成立后,供销社在村里设立了商店,洋布逐渐普及。原来,所谓的洋布就是机织的布。

大哥在安阳的几天里,我们议论的大多是陈年往事,童年的事仍记得清晰。说到现在农村的变化,他大手一挥说:“好得很!二弟,咱准能想到种地不交公粮还吃补贴!过去一到农忙时节,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收麦种秋、收秋种麦这个时段最少忙3个月。现在是机耕、机种、机收,当天小麦装袋上秤,粮商当场收购立马变成现金,回家不误吃饭,不误看电视。家里各种电器样样俱全,出门坐公交车,有些年轻人还开着小汽车,神气得很,不比兄弟你家差!”

大哥想小子要回家,我问他坐哪趟火车合适,他说:“不坐火车走高速路,不到6个小时就到家了。”

我家的“雪莲”情

■ 佟才录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是老么,因此父母非常溺爱我,每次出门走亲戚都一定要带上我。

一次,大姨家的大表哥结婚,父亲母亲带着我去大姨家参加婚礼。来到了大姨家,二姨、二姨夫、三姨、三姨夫都已经来了。家在城里的二姨夫是开着小汽车来的,家在镇上的三姨夫是骑着摩托车来的,只有爸爸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见了二姨夫和三姨夫,爸爸从衣兜里掏出一包“葡萄”烟,先抽出一支递给了二姨夫,不想二姨夫一抬手把爸爸递过去的烟给挡了回来,然后从他的皮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黄鹤楼”香烟,说:“现在谁还抽‘葡萄’烟啊?我还是最喜欢抽我的‘黄鹤楼’。”爸爸尴尬地又把烟递给三姨夫,三姨夫不接爸爸的烟,却掏出身上的打火机,咔一下打着给二姨夫叼在嘴边的“黄鹤楼”点燃,然后把手伸向二姨

支递给父亲。父亲的手颤颤的,哆哆嗦嗦地把烟放在嘴角。我给父亲点燃,父亲使劲地吸了一口,然后长长地吐出一缕儿烟雾,眼睛湿润地说:“‘黄鹤楼’,好烟啊好烟!”我豪气地对父亲说:“好抽你就管够抽!往后我供着你。”以后,我每月发薪水都不忘给父亲买两条“黄鹤楼”捎回家,父亲打电话说不用买那么多,他抽不了,一条就够够的了。我又打电话给母亲,烟瘾很大的父亲,怎么一月只抽一条烟?母亲告诉我,你爸是心疼你花钱,在“黄鹤楼”烟盒里装着“葡萄”和“黄鹤楼”两种烟,在外面就抽“黄鹤楼”,还对人说是女儿孝敬的,在家里抽“葡萄”。

后来,我在镇上开了一家超市,烟柜里“黄鹤楼”是主打烟。父亲每次来家里,我都指着烟柜里的“黄鹤楼”,对父亲说:“爸爸,咱家现在有的是‘黄鹤楼’,你就放心大胆地可劲儿抽吧!”父亲眉开眼笑地说:“得嘞!还是我闺女孝顺我,懂得她老爸!”



洋火的记忆

■ 刘振龙

前不久,老家邻居一位大哥去北京探亲,返程途经安阳到我家,因为我们是发小,挽留他小住数日。他大我两岁,身体硬朗,性情直爽,快人快语。他人缘好,但烟瘾很大,一天到晚早烟袋不离手,塑料袋里装着当地产的“一口蒙”烟丝,一响至少得要吸20烟袋。他突然说:“二弟,家有洋火吗?给我找一盒。”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但马上悟了过来,洋火不就是火柴吗?我递给他一个打火机,他说那不好使,用不惯。我赶紧找出家里仅有的半盒火柴,他笑着说:“还是这用着得劲。”大哥要用洋火吸烟,使我回想起60多年前许多有关洋货的事情。

所谓洋货,是与土造货相比而言的。那个时候我国根本没有几个像样的工厂,很多外国的商品都冠以“洋”字,比如洋布(机织布)、洋车(自行车)、洋烟(纸烟)、洋线(机纺棉线)、洋油(煤油)、洋钉(机制钉)、洋火(火柴)、洋灰(水泥)等。

洋火与火镰。我老家周边那几个县的农民大都吸旱烟,这是历代传下来的习俗,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吸旱烟。想当年,由于家境贫寒,爷爷吸烟舍不得花钱买洋火,就采割一种青灰色的嫩蒿,晒干后搓成像食指粗细的蒿绳,用火镰打在火石上,撞出火星,点燃易燃的蒿绳,然后用嘴猛一吹蒿绳燃出火苗,点着烟,一连吸3袋才过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他的子孙们买来火柴,爷爷再也不用着火镰了。至今,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会不时说出“洋火”这个词。

洋车与怪物。我国是自行车王国,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一辆。可在1952年以前,我们全村乃至全乡都看不到一辆自行车,偶尔进城看到有人骑着非驴非马的铁家伙跑得飞快,觉得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那是洋车。想当年,我们村刚解放,驻村土改工作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把我们这些七八岁以及十几岁的男孩子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在村口站岗查路条。有一天,一个穿戴整齐的青年人骑车到村口,十几名儿童团员一拥而上堵住他,看他骑的这个怪物便觉得不像好人,向他要路条。他说,你们村的村长是我姐夫,我是来串亲戚的。我们说,那不行,必须凭路条才能放行。他拿出盖有城关镇红印的路条后,我们才放他进村。他骑车在前,我们这群孩子跟着洋车跑,一直跑到村长的家门口,伸手摸一摸这个竟然能跑那么快的铁家伙,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54年年底,县乡干部在村里搞农业合作社试点,不断有人骑车来来往往,见得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了。1955年,我用驻村乡干部的洋车学骑车,因我个高腿长,两天就学会了。1985年,我们全家五口人每人一辆自行车,出门办事非常方便。

洋布与粗布。现代人买衣服非常讲究布料和款式,但在60多年前,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线织成粗布缝制而成。童年时代,每当我穿上新衣服,马上就会找玩伴炫耀一番。村里有个富家子弟穿的是洋布衣服,远看很平展,近看没有皱褶,用手摸摸感到很柔软,我很羡慕。他昂着头说:“这是洋布做的。”我回家问爹娘,啥是洋布?父亲说,就是洋人织的布,咱买不起。我说:“俺娘做的衣服更结实,我才不稀罕哩。”新中国成立后,供销社在村里设立了商店,洋布逐渐普及。原来,所谓的洋布就是机织的布。

大哥在安阳的几天里,我们议论的大多是陈年往事,童年的事仍记得清晰。说到现在农村的变化,他大手一挥说:“好得很!二弟,咱准能想到种地不交公粮还吃补贴!过去一到农忙时节,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收麦种秋、收秋种麦这个时段最少忙3个月。现在是机耕、机种、机收,当天小麦装袋上秤,粮商当场收购立马变成现金,回家不误吃饭,不误看电视。家里各种电器样样俱全,出门坐公交车,有些年轻人还开着小汽车,神气得很,不比兄弟你家差!”

大哥想小子要回家,我问他坐哪趟火车合适,他说:“不坐火车走高速路,不到6个小时就到家了。”